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史略(1949—2000)

吴友法, 车 英

(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友法(1948-),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德国史及编辑学研究;
车 英(1954-), 男, 河北望都人,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国际私法学及编辑学研究。

[摘 要]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学报之一, 在我国学报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以 1930 年正式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始, 至今已有 70 年的历史。探寻武汉大学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足迹, 总结武汉大学学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于办好今天的《武汉大学学报》, 繁荣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促进教学和科研, 对于了解我国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哲学社会科学版; 社会科学版; 人文社会科学版; 历史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725-10

1949 年 5 月 16 日, 武汉解放, 武汉大学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武汉大学从此进入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人才的崭新历史阶段。

1953 年初,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后, 把全部精力投入建设新型的武汉大学、发展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上。

李达校长十分重视学校的科研工作, 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 既是教学机构, 又是研究机构, 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是相互作用相互提高的, 是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所以, 学校除了搞好教学之外, 还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为此, 武汉大学

在 1955 年决定出版发行《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并成立了由唐长孺、程千帆、萧杰五、皮高品、余志宏、吴纪先、汪治荪、陆季蕃、曹绍镰、郑伯华、刘绶松、韩德培等人组成的《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编辑委员会, 唐长孺任主编, 程千帆、萧杰五任副主编。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号于 1956 年 11 月正式出版发行。李达校长亲自撰写《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指出: “中共中央提出在文艺方面和科学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 学术界显得更加活跃起来了。我们学校在这个时候出版人文科学学报, 正好参加争鸣, 让含苞已久的花朵开放出来。”^[1](第 1 页) 李达校长十分强调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继承性和批评性问题, 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过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遗产有一定的继承关系”^[1](第 1 页)。因此,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中的“有些人所

做的研究如果对科学确有贡献,即使是一点一滴,我们也应当肯定”,“他们通过唯心主义认识论所做出的一般性的荒谬的结论,则非排斥不可。”^[2](第1版)为此,他提倡要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李达校长十分重视在学术领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议,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1](第2页)。他在《创刊词》中最后号召在学术领域开展百家争鸣,鼓励大家“要信心百倍地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学术争论,辨明是非,克服教条主义倾向,把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地推向前进”^[1](第2页)。李达校长提出的这些看法无疑是办好武汉大学学报的重要指导思想。

创刊号除发表李达校长的《发刊词》和撰写的文章外,还发表了卢干东、陆季蕃、曹绍濂、吴纪先、吴于廑、许俊千、刘永济、谭戒甫、刘赓、李格非、杨端六、皮高品等人撰写的论文。这一期共306页,将近35万字。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开始为不定期,篇幅也不定,这一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62年。少的一年出2期,多的一年出了10期。1957年共出2期。1958年为半年刊,定为上半年5月15日出版,下半年11月15日出版,并交邮局发行,但实际上只出1期。1959年起又为不定期,并在内容安排上有所变化。1959年和1960年都是按学科专业出版“专号”,并在中文目录之后附有俄文目录。1959年出“专号”10期,1960年出“专号”6期。1961年停刊一年。从1962年第1期起,《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改名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共出2期。从1958年到1962年,主编仍是唐长孺,副主编是余志宏,编委会成员还有尹景瑚、刘赓、刘绶松、江天骥、吴于廑、陆季蕃、肖杰五、郑伯华、徐家麟、薛祀光等人。

从1963年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基本上正规化、规范化,为季刊定期发行,每年3月、6月、9月、12月出版,在编辑方针和组稿等方面也有切实可行的规则。《征稿简则》对学报方针和性质、稿源有具体规定,指出“本学报为综合性学术季刊,专载本校有关学术性专题研究论文、报告,凡适合上述要求的武汉地区其他院校稿件亦所欢迎。”^[3](封3)这就明确规定学报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刊登稿件以本校为主,也适当刊登少量校外稿件。对来稿要求也有具体规定:“来稿尽量用语文体(必要时可用文言文)。加标点符号。文字力求精炼,每篇字数一般

最好控制在一万二千字之内”;“来稿请用稿纸缮写清楚,自左至右横写,文内插图请用白纸墨笔另行绘制,附贴于文内适当位置,并略加说明”;“文稿中之引文、注释,置于每页文末或全文后面,并请校对清楚,注明作者、题目、版次、卷数和起讫的页数”^[3](封3)。对稿件的处理,规定“由学报编委会负责审查,必要时,得退还作者重加整理;在不变动原稿的意义下编委会有删改权”;稿件如选用,“付排后,由作者自行校对,于规定期限完成校样工作,并以不改动原文为原则,以免造成排版困难”;稿件登出后,“除酌至稿酬外,并赠送本刊一本,抽印本二十本”;“来稿如不采用,一律退还”^[3](封3)。1963年至1965年连续定期、稳定出版了3年。这一时期的编委会由尹世杰、刘绶松、刘赓、江天骥、余志宏、吴于廑、吴纪先、郑伯华、唐长孺、黄元福、潘耀琮等人组成,唐长孺仍为主编,尹世杰、刘绶松、余志宏为副主编。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被迫停刊。

从1956年至1965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连续出版历经近10年,共出34期,发表文章331篇,其中哲学48篇、中外语言文学81篇、历史学42篇、经济学98篇、图书馆学44篇、法学仅4篇(院系调整后,法律系并入他校,力量大为削弱)、学术动态14篇,经济学和中外语言文学发表文章较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7年起,我国实际上只是刚刚迈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门槛。由于我们党开始对整个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缺乏经验,从1958年开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出现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过急性狂热,“反右”斗争又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领域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武汉大学出现了“拔白旗”、“插红旗”、师生“打擂台”、学生“编讲义”、“放卫星”等偏向,科学研究工作无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思想的冲击。历史车轮的轨迹不可能不在那个时代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论著中有所反映,因而学报也不可能不留下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发表一些“左”的思想观点的大批判文章和附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文章,如批“右倾”、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跃进”、“放卫星”、批《海瑞罢官》等内容。这些文章约占19%。

由于李达校长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针对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师生关系紧张、社会活动过多、生产劳动过多、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及时指

出要在武汉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善师生关系,“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4](第1版),“为把武汉大学建成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和科研、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基地而奋斗”^[5](第1版),尽力扭转学校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在李达校长领导下,武汉大学虽然受到“左”的干扰和影响,但学术空气是比较活跃的,教学和科研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种气氛和环境中,《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虽然发表了一些“左”倾观点的文章,但仍然始终保持着固有的学术性的正确方向,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力求反映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的现状。在1956年至1965年发表的331篇文章中,学术论文约占60%(不包括一般性批判性论文)。1956年至1958年发表的文章中除几篇反右文章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大于此平均数,约占80%。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刘贇教授发表了《小学札记》、《“喻”“邪”两组古读试探》、《重订〈汉语言文字音系略例〉》、《广济方言之调类与调值》等学术论文12篇,历史系的谭戒甫教授发表了《周初矢器铭文综合研究》(近5万字)、《屈原〈招魂〉的研究》、《论“若”字的本义及其演变》等3篇学术论文,都有较高的学术性。另外,还有不少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因此说,学术性论著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发表文章的主体部分。

二

纵观这段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我们认为,主要具有以下特色:

1. 以刊登学术论文为主,同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武汉大学学报的主体编辑方针。

1960年第1期发表的李达校长撰写的《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文,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6](第1页);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采取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即通过学习认识论的有关论述,树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观点,强调“要回到‘实践—认识—实践’那个公式”中去^[6](第2页)。这在教条主义很盛行的年代,不难看出李达校长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是多么鲜明!另外,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准则》(刘绶松)、《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吴纪先)、《我们是怎样以毛主席思想指导贯彻启发式教学的》(经济学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读书笔记》(杨天民、

刘云彬)等文,从不同角度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 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主要从1959年出版“专号”开始的,发表的文章约占25%。

这段时期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一般性现实问题,主要以经济方面文章为最多,如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研究,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当时国民经济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文章约占17%,其中不少是调查研究的内容,如1959年第1期刊登5篇、第5期刊登4篇,都是关于农村经济问题调查报告。这些研究现实的文章,不管其阐明的观点正确与否,但这种注意刊登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重视研究现实问题文章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第二个层次是关于涉外关系方面的文章。如唐长孺、石泉等人撰写的《同情西藏叛乱的人有什么历史根据?》(1959年第4期)一文,是针对国外少数别有用心分子诬蔑我国平定西藏叛乱一事而写的批驳文章。1959年,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叛乱被平定后,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同情西藏叛乱分子,散布攻击中国政府、企图分裂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谬论,如杜勒斯叫嚷什么“中国侵略西藏”,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大放厥词,称西藏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反侵略的”。为驳斥这些谬论,该文用大量历史事实,阐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享有完全的主权,这个关系在13世纪中叶已经确定下来”。从13世纪中叶开始,“西藏地方的行政组织、军事组织一切都按当时的中央政府的规定组成,地方官员由中央委任担任军政事宜。”^[7](第6页)随后历代中央政府,即使清朝自乾隆统治时起,政府日益衰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也并没有动摇。”^[7](第8页)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这些少数同情西藏叛乱分子对中国拥有西藏主权问题的恶意攻击。这一层次的内容的文章发表较少。

第三个层次是现实政治性比较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政治批判性的,极“左”成分比较多,主要以批“右”倾思想为主,约占8%,1959年和1960年发表的较多。

另外,还发表了一般性批判文章,批判各学科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论,这方面文章既有学术性、理论性,同时又带有“左”的政治色彩,这些文章

约占11%。

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按学科分别出版“专号”,这在学报史上是一个创举。1959年出版了10期“专号”,刊文106篇,其中“语文专号”3期(第2、6、10期),刊文25篇;“历史专号”2期(第4、8期),刊文10篇;“经济学专号”2期(第1、5期),刊文19篇;“图书馆学专号”2期(第7、8期),刊文25篇;“哲学专号”1期(第4期),刊文21篇。1960年出版6期“专号”,刊文49篇。第1期是“经济学专号”,刊文14篇;第2期是“图书馆学专号”,刊文11篇;第3期是“语文专号”,刊文7篇;第4期是“经济学专号”,刊文10篇;第5—6期合刊为“历史专号”,刊文7篇。出版专号的优点是内容比较集中,为专业人员阅读、收集、保存提供了方便,一本学报就等于一本专业论文集,比较受欢迎。如1959年第4期的“历史学专号”,主要发表中国革命史方面文章和史料。《鄂东地区党史调查工作总结》一文,介绍了历史系150名师生从1958年11月底开始在3个半月时间内调查英山、罗田、黄梅、广济、圻春、浠水、黄冈、新洲、红安、孝感、黄陂等8个县的党史情况。这次调查访问了7247位革命老人,召开了1476次座谈会,收集了1000万字资料。另外,这一期还发表了党史调查队黄陂小队整理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陂工人运动的高潮》(资料)、党史调查队黄冈小队整理的《黄冈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资料)。这些资料对编写鄂东地区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这一期“历史学专号”还发表了《抗日战争前汉口福新第五厂和申新四厂的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蔡树立整理)等文。又如1959年第7期“图书馆学专号”,以发表目录、分类方面的文章为主,刊文有《关于苏联目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苏维埃目录学”编辑部》、《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陈光祚)、《武汉大学图书学分类法简介》(图书馆学系三年级科研小组)、《我们是怎样选定“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促进科学发展的正确方针。为努力贯彻这一方针,给不同学术观点和思想的作者开辟争鸣园地,发表文章,互相切磋,交流学术观点,是这一时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又一特色。1956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如何表达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吴纪先)、《略论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吴于廑),是中国学者对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从1953年6月开始的对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讨论中

提出的观点的商榷性论文,具有独到的精辟见解。另外,还发表了《关于宪法学对象一些问题的商榷》(陆季蕃)、《关于〈图书分类浅说〉中的几个问题——和刘国钧先生商榷》(皮高品)、《是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肖葳父)、《再论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兼与刘成瑞同志商榷》(尹世杰)、《有关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与王亚南同志商榷》(李守庸)、《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等同志商榷》(肖致治)等文。这方面文章约有15篇,绝大部分是在1962年至1965年发表的。在“左”倾思想占统治的年代,能够发表这么多的商榷性文章,无疑是克服思想上的封闭性的远见卓识之举,对活跃武汉大学师生的思想、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学生撰写的文章,约有23篇之多,主要发表在1959年和1960年。这是与当时武汉大学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提倡学生参加编讲义及师生关系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有关。如果对此姑且不论,就高校学报发表学生的文章这件事而言,无疑对激发在校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科研能力,活跃学校思想和学术空气,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前《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十分重视书评文章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上没有能坚持,这方面文章几乎没有一篇。

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最后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气候中,《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于1966年被迫停刊。随后,在《武汉大学学报》历史上出现了长达近8年的空白时期。

三

1973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指示恢复出版大学学报。不久,国务院批准武汉大学恢复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两种学报。1973年9月,在与学术研究气氛很不协调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重新复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复刊后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无可避免地偏离其固有的学术性的航向,基本上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保持协调一致的节拍,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附和当时政治运动的内容。复刊后的第

1期学报共刊文24篇,其中5篇是转载的党的“十大”文件,其余均为批林批孔文章。

复刊后的学报为不定期,在试刊两期之后,被批准为季刊,公开出版,由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从1975年第3期起,改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同时,在学报的出版管理、订阅、组稿等方面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该期《致读者》指出:“本刊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邮局发行,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编辑部不办理订阅、零售手续”,“欢迎各地读者来稿”,“勿一稿多投,来稿请用方格稿纸,誊写清楚”,“引文详细说明出处”,“凡不刊用稿件,不退稿,请自留底稿”^[8](封3)。

从1973年至1976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连续共出16期,发表文章323篇。由于当时宣传舆论大权被“四人帮”所把持,极“左”思潮严重冲击和影响了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因此,在所发表的文章中,除全文转载党的“十大”政治报告等党的文件及有关文章12篇外,其他310篇大多为“紧跟形势”的大批判文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体会”以及空洞的“政治宣传”和批“右倾”的文章,学术研究论文极少。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和学报工作虽有复苏的迹象,但并未完全走上正轨。

从1977年至1978年这两年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共出12期,发表文章182篇,其中全文转载刊登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十一大”文件等9篇,刊登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狠揭猛批“四人帮”为主,结合形势进行“理论问题讨论”等方面内容文章达145篇,而纯学术论文只有28篇,仅占两年发表文章总数的15%。

1973年至1978年这5年多时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共出版28期,发表文章515篇。在这段时间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虽然恢复出版,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学报固有的学术性特色未能得到体现,从形式到内容基本上政治化,变成附和现实进行政治宣传的一般性刊物。

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在学校党委及行政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时拨乱反正,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学报编辑队伍的建设,努力恢复和提高武汉大学学报的学术地位。

从1979年第4期起,《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由原来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改由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1980年1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成立了以吴于廑教授为主编,吴纪先、王文生、陆永良为副主编的8人编辑委员会(王德华、江天骥、何天齐、唐长孺、黄庆璋、彭斐章、韩德培、潘耀琼为编委)。随后,根据国家教育部文件精神,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由原来附属于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升格为系、所一级的独立单位。1981年5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名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1980年9月起,《武汉大学学报》被国家批准由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公开发行人。

1984年,武汉大学调整了学报编辑部的领导班子,加强了编辑队伍建设。从此,武汉大学学报进入了解放以来的编辑出版工作的最佳时期,学报的质量不断提高,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

在1979年至1989年这10年的时间里,《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出版60期。发表的文章主要以学术论文、研究现实问题文章为主,其中政治学70篇,约占发表总数的6.9%;哲学和美学158篇,约占发表总数的15.6%;经济学和管理学196篇,约占发表总数的19.1%;中国语言文学184篇,约占发表总数的18.1%;历史学160篇,约占发表总数的15.7%;外国语言文学59篇,约占发表总数的5.6%;图书情报学51篇,约占发表总数的5%;教育学25篇,约占发表总数的2.4%;法律学38篇,约占发表总数的3.6%;因1983年才设立新闻系,故新闻学论文仅发9篇,约占发表总数的1.5%;动态49篇,约占发表总数的4.7%。

从1980年8—9月起开始创办了《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至1987年12月,共出版10期(1981—1985年停刊)。其中《马雅可夫斯基研究》1期;《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1期;《研究生专号》2期;《青年教师论文集》1期;《考古学专号》1期;《经济学专号》1期;《高等教育与行政管理专号》1期;《世界经济专号》1期;《政治教育学专号》1期。在《马雅可夫斯基研究》中收有戈宝权的《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余振的《诗人之死》、汪飞白的《锺的提炼及其他》以及骆文、徐迟、高莽等人的文章;在《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收有吴于廑、齐世荣等知名学者的文章多篇;在《考古学专号》中收有唐长孺教授所作的序言。1986年武汉大学学报还创办了一期社会科学译丛《环境法专号》,在国内法学界颇有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武汉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恢复和加强了学报固有的学术性特色,开创了武汉大学学报自创刊以来的新时期。

四

这个时期《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坚持了以研究、交流学术为根本任务的原则。和其他高校学报一样,武汉大学学报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报的学术性问题受到了应有的重视。高等学校学报既然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那么,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来看,一是坚持从本校实际出发,适应自己学校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与学校的性质、任务相协调,同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同步发展,真正把《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办成反映武汉大学教学、科研水平的窗口。比如,在世界史方面,围绕吴于廑教授所领导的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的中心课题,及时发表专辑文章,还突出重点出版了一辑以世界史研究为中心内容的《武汉大学学报论丛》,既反映了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又为国内外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又比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吐鲁番文书是武汉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武汉大学学报专门组织了唐长孺教授的疑案所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内容的学报专辑,发表的文章在学术界反映极好,在国外也有很大反响。二是力图改变过去那种把学报看做来什么文章发什么稿的单纯发表园地的观念和局面,逐步形成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探索性、导向性方向转化的新观念和新局面。从这个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来看,提出的问题的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定的成绩的。比如《关于改革问题的历史反思》、《关于中西文化争论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结合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探》、《高等教育投资的微观经济效益分析》等都是突出的成果。这些论文,无论是提出问题的超前度,还是分析问题的深刻度,都是属于富有探索性和导向性的佳作。三是在发表学术动态、书评的数量和质量上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从 1986 年开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专门开辟了“武汉大学学人谱”专栏,专门述评武汉大学成绩卓著的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

想以及其严谨治学的学风。这样做,对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树立学习的楷模,活跃武汉大学的学术空气,推动武汉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深入发展,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高等学校是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学校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库,而作为反映高等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窗口的学报,正集中地体现了高校作为思想库的这个特点。《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发表文章时,试图从这几个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一是为党和国家制订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论证;三是为各项社会服务提供咨询;四是为一切实创造发明提供思想。比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了适应拨乱反正、坚持正确路线的需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省内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并组织编辑部的有关编辑,编写了《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小册子,交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了社会上的好评。又比如,1984 年第 5 期发表的《劳动消耗转化论是对现行分配体制的一项突破》一文,根据马克思关于成本问题的论述,依据价值构成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将成本(C+V)与工资、奖金、津贴捆在一起,在一个企业高利润、低成本、使各项定额趋于同行业先进水平的前提下,让 C 与 V 之间互相转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对现行分配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一项难能可贵的突破。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社会好评,“光明日报”、“文摘报”很快摘登,中央劳动人事部召开有关企业工资改革的会议,专门邀请作者参加,并作专题发言。另外,还先后发表了有关“两通起飞”、“招标与投标”、“绝对成本控制法”等论文,都是对武汉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咨询,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立刻发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招标与投标问题,1983 年首先在武汉洗衣机厂试行,当年使这个老大难厂一跃而为先进企业,利润增加 200 多万元,第二年在武汉市 8 个企业推广,再加上其它措施,使当年利润增加 1 300 万元。原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对此极为赞赏,十分满意地说:“武汉大学为武汉市出了三条妙计,过去说,一字值千金,现在是一计抵万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理论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道路是广阔的。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来看,编辑部对此问题并没有做偏狭的理解,而是考虑到了这个服务是有着丰富的、多方面的内容的。这里,既包括对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个方面发展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也包括从理论上回答广大干部、群众、青年从自己学习、生活和工作实践中提出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认识能力和思想理论水平,也包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等等。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学报也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好文章。

第三,坚持改革,勇于创新。学报,作为反映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它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勇于创新。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装饰门面、东扯西拉地炒剩饭,而是在于探索未知,发现真理,对前人已有的学术见解,有所修正、扬弃和发展;对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有所发现,有所论证,有所突破。学报理所当然的要以探索、阐明尚未被人发现的事物的本质规律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有鉴于此,《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坚持改革、勇于创新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在学科领域方面,注意打破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体制,优先发表一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研究论文,而且在这些论文中,力求使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紧密结合,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服务。为了抓好“创新”,一是学报编辑人员通过举办讲座,坚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有关的新技术、新知识,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实现知识更新;二是深入专业领域,积极了解各学科、各专业的学术动态,及时掌握学科发展的新动向、新信息;三是深入作者之中,和作者交朋友,注意了解并掌握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课题和进展,及时组稿。在文章要求方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别强调四新:一是观点新;二是材料新;三是方法新;四是语言新。比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大学生有什么新的发展趋势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黄训腾、郑永廷撰写的《把握学生中新的发展趋势,积极做好引导工作》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了当代大学生新出现的四个发展趋势:一是向高学位发展的趋势;二是向网络化组织发展的趋势;三是多途径成才的发展趋势;四是精神文化生活高要求发展的趋势。论文发表后,《新华文摘》和《光明日报文摘》都及时转载和摘录。陶德麟教授撰写的《哲学专业教学改革之管见》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后,《人民日报》及时全文转载。湖北武汉地处中原,有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新资料有待于广大学术理论工作者去发掘和整理,这对于繁荣学

术、促进科学研究都是大有益处的。武汉大学学报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1985年第1期《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就发表了《闻一多先生未刊稿略》,这篇文章对闻一多先生自1919到1946年未刊的日记、习作、读书札记、讲稿、教学计划、文章提纲片断、资料摘抄、学术论文、诗歌创作、剧本、印谱、工具性表格等等做了概要的论述,这对于研究闻一多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文学史,都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及时全文加以转载。

在提倡新方法方面,这个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考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及时介绍国外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一是注意刊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一些新方法(比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社会科学的论文。在这两个方面都先后发表了一些文章。比如1985年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科学论断研究趋势的分析》一文,就很有价值。这篇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西方科学论断的研究进行分析:一是从静态的研究转向动态的研究;二是从规范性研究转向描述性研究;三是探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并指出这三个方面的新趋向是西方科学哲学派别的基本发展趋势。这篇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及时予以摘登。

第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无产阶级的“双百”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手段,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才能达到繁荣艺术、发展科学的目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坚持贯彻“双百”方针方面,注意到了以下几点:一是要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能无限上纲,动辄追动机、查根源、搞过火的政治批判;二是在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上一定要对事不对人,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哪怕是错误的,也不能围剿,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能因人废言;三是要允许个人有研究和争鸣的自由,以鼓励新的学术思想,支持创立新的学派;四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学术争论中的不同意见,不能用行政手段裁决,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要急于做结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先后发表了几组争鸣的文章,影响较大的有刘继曾、毛磊、袁积成与张光宇关于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争鸣文章,刘继增等的文章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是在革命形势万分紧张的情况下自动交出的;只交出部分枪支,大部分枪支被埋藏起来了,交枪是为了我党集中力量抓其他更重要的军事工作,

这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张光宇的文章则不同意这个观点,提出:第一,当时形势未必那么紧张;第二,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全部交上去了;第三,要把这一事件与当时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考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组争论文章发表后,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不少报刊还加以转载。

第五,坚持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要出成果,更要出人才,真正成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中心。这里,首先要有满腔热忱、眼睛向下、尊重“小人物”的精神;其次还要有沙里淘金的耐心,去发现人才,发现好的苗子。从这个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来看,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从 1984 年到 1987 年 4 年的学报来看,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占了 60% 以上,其中青年作者的论文几乎占了一半。如郭齐勇在 1986 年第 5 期《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一文,在对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说”,认为探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须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学割裂的思想方式;中国文化的前景,既不是传统的连根拔除,全盘推翻,也不是传统的自我复归,卷土重来,而是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母体上,从全方位、不分主从地、更加广泛、深入地互相渗透、补充和融合。郭齐勇的论文一发表,《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立即予以摘登和转载。

1984 年,武汉大学举办了一次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展览,其中有近 30 名的青年教师的科研论文(不少还是处女作)就是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也给予一定的关心,先后开辟了研究生、大学生毕业论文专栏,专发优秀的毕业生论文,仅 1981 年到 1982 年连续发表了论文(包括摘要)近 36 篇。从 1986 年起,还以《武汉大学学报论丛》的名义专门编辑出版了 2 期研究生专号,1 期青年教师专号,共发论文 67 篇。武汉大学学报对培养青年教师成材,无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

1990 年以来,武汉大学学报进入了全面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最好时期。

从 1990 年第 1 期开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是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副主编先后为杨小岩教授(1990 年第 1

期~1991 年第 2 期)、郑传寅教授(1991 年第 3 期~1993 年第 4 期)、张炳煊、吴友法教授(1993 年第 5 期~1999 年第 2 期)、吴友法教授(1999 年第 3 期~)。

1994 年,《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第 1 期改名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起又改名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现任主编仍是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前任校长陶德麟教授、副主编为吴友法教授。

这个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宣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繁荣学术事业,开展学术争鸣,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结合武汉大学文科优势,辟有中外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等栏目。现有编辑 6 人(2 人具有正高职称,2 人具有副高职称,2 人具有中级职称),还聘请了一位学有所成、德高望重的专家担任学报的兼职编辑。全体编辑人员兢兢业业,工作认真负责,严把发表文章政治质量及学术质量关。编辑工作采用三审(初审、复审、终审)五校(三校+互校、通读清样)制,校对质量差错率在整体上保持不超过万分之一。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配备了微机照排系统,每位编辑都配有 586 微机,实现了编辑排版现代化;编发的文章不转版,排版印刷规范、美观大方,印刷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与国际期刊接轨,以及适应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繁荣发展的需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从 1999 年第 1 期起改为大 16 开本,以更高的政治、学术质量和印刷质量服务于国内外读者。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的文章大多数具有一定创见和学术理论深度,不少文章研究的是该学科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有的是国家、教育部重大或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代表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在教育部及出版管理部门和学校领导的支持关心下,依靠全校师生和编辑人员的努力,《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整体质量始终处在全国文科学报的前列,很好地反映了武汉大学文科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的重要地位。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在 1992 年、1995 年、1999 年连续被评为“湖北省一级优秀期刊”;1991 年、1994 年先后荣获湖北省先进期刊编辑

部一等奖;1995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列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1998年获湖北省出版优秀佳作奖;1992年、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均被列为社科综合类核心期刊;1999年被评为全国“双十佳文科学报”第5名;2000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被列为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第4名。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自1990年以来获省级(或类似省级)奖约有16项,其中1995年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评选中,有6篇论文分别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提名奖;1998年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有2篇论文均获三等奖,大学学报论文获奖,仅武汉大学学报和吉林大学学报(1篇)两家;1篇论文获1996年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1篇论文获全国火炬高新技术及产品展览会银奖;1篇论文获1998年全国首届宋庆龄基金会奖;5篇论文发表前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组织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研讨会”和“学习《邓小平文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入选论文奖。另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有23篇论文获湖北省委宣传部历届专题论文一、二、三等奖。据统计,《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文章的转载率比较高,转载篇次平均在60—70%左右,从1992年以来一直居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前5名:1992年为第3名、1993年为第2名、1994年为第4名、1995年为第4名、1996年为第5名、1997年为第3名、1998年为第3名、1999年仍为第3名。1990年以来有几十篇论文或获省部级奖,或被《新华文摘》全文摘要转登。例如(限于篇幅,故不能一一列出):

刘华才撰写的《人类起源地新论》(1990年第1期),1995年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提名奖;《新华文摘》(1990年第5期)全文转登。

陶德麟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1990年第3期),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一等奖;陶德麟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1995年第2期),在理论上重大创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著名哲学家邢贲思、黄楠森等给予高度评价,《新华文摘》(1995年第12期)全文转登,1996年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一篇好文章奖。

赵廷光撰写的《论中国刑法专家系统的研制》(1991年第2期),1991年获全国火炬高新技术及产品展览会银奖,1995年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提名奖。

傅殷才撰写的《吸取西方经济学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2年第4期),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二等奖。

虞崇胜撰写的《中国近代行政管理史述略》(1993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6期)全文转登。

郭齐勇撰写的《论中国哲学资源的当代价值》(1993年百年校庆特刊),《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全文转登。

薛国中撰写的《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成败》(1994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4年第6期)全文转登。

李双元等撰写的《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1994年第3期),《社会信息》(1994年第8期)摘登,人大复印资料《法学》(1994年第8期)全文转登,德国《国际私法学年刊》1995年全文转登。

辜胜阻撰写的《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的思路与对策》(1994年第5期),提出了“开发性移民”的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被有关部门采用,对移民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湖北省、四川省及重庆市等有关单位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2日)摘要转介思想和观点。

梅荣政撰写的《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考》(1994年第6期),被多家刊物转登,1998年荣获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刘德厚撰写的《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1996年第2期),1998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丹林撰写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及其启示》(1996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全文转登。

石云霞撰写的《反腐败与保持政治稳定》(1997年第1期),被多家报刊转登,并获中宣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

石光荣撰写的《论科技革命对现代史学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要求的的影响》(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0期)全文转登。

涂险峰撰写的《大江健三郎小说与现代文明的危机》(1997年第4期),1998年获全国首届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奖。

冯天瑜撰写的《“可持续发展”的哲理之源》(1998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全文转登。

李植枬撰写的《20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地位》(1999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全

文转登。

纵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 70 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多年的新鲜经验告诉我们,要办好学报,最关键的问题是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关心,编辑部要有政治业务能力强、得力能干的领导和一支训练有素又热心于“为人作嫁衣裳”的编辑队伍,要有严格的审稿制度,要经常联系作者,了解各学科领域的信息动态,及时发现优秀论文,这些都是办好学报的根本保证。

70 年的风风雨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了办好 21 世纪的《武汉大学学报》,继续为促进强强联合之后的新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做出贡献。鉴于此,我们写作此文,简略地分篇记录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自创刊以来的历史,给 20 世纪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画上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从 2001 年、即从 21 世纪开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改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两个刊物向国

内外出版发行,继承 1930 年武汉大学文科学报创刊时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的格局。新的武汉大学学报将随同强强合并后的新武汉大学进入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参 考 文 献]

- [1] 李达.《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发刊词[J].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1).
- [2] 李达. 开学讲话[N]. 新武大,1953-10-23.
- [3] 本刊编委会. 武汉大学学报征稿简则[J].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3,(1).
- [4] 李达. 中共武汉大学第二届党工会开幕词[N]. 新武大,1959-01-19.
- [5] 本报记者. 我校首届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开幕[N]. 新武大,1959-02-04.
- [6] 李达. 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J].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1).
- [7] 唐长孺,石泉,等. 同情西藏叛乱的人有什么历史根据? [J].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4).
- [8] 本刊编辑部. 致读者[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3).

(责任编辑 叶娟丽)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in 1949—2000

WU You-fa, CHE Ying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WU You-fa(194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and German history; CHE Ying(1954-),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tc.

Abstract: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started in 1930 and named Wu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 Wuh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Quarterl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cademic periodical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hich has the history of 70 years in the 20 century. Looking for the historic steps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is of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in making this academic periodical even better, making the academic fields of Wuhan University even flourishing, promoting the teaching & researching forward, and grasping the developing lines of the academic periodical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Key words: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history